

中国近代文学大系

散文集 1

主编 任访秋

副主编 关爱和 王广西 任亮直

李慈健 袁凯声

上海书店



In 12 Divisions & 30 Volumes

**A TREASURY OF MODERN
CHINESE LITERATURE**

THE THIRD DIVISION,

PROSE WRITINGS

4 VOLUMES, NO.1

SHANGHAI BOOK STORE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近代文学大系

第3集·第10卷·散文集一

任访秋 主编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9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江苏海门印刷厂排版

昆山市亭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$29\frac{7}{8}$ 插页 4 字数 670 千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4500

ISBN 7-80569-324-2/I·104

定价(精) 22.80元

中国近代文学大系

各分集主编

文学理论集	徐中玉	俗文学集	范伯群
小说集	吴组缃		金 名
	端木蕻良	民间文学集	钟敬文
	时 萌	书信日记集	郑逸梅
散文集	任访秋		陈左高
诗词集	钱仲联	少数民族文学集	马学良
戏剧集	张 庚	翻译文学集	施蛰存
笔记文学集	柯 灵	史料索引集	魏绍昌
	张海珊		

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》主要工作人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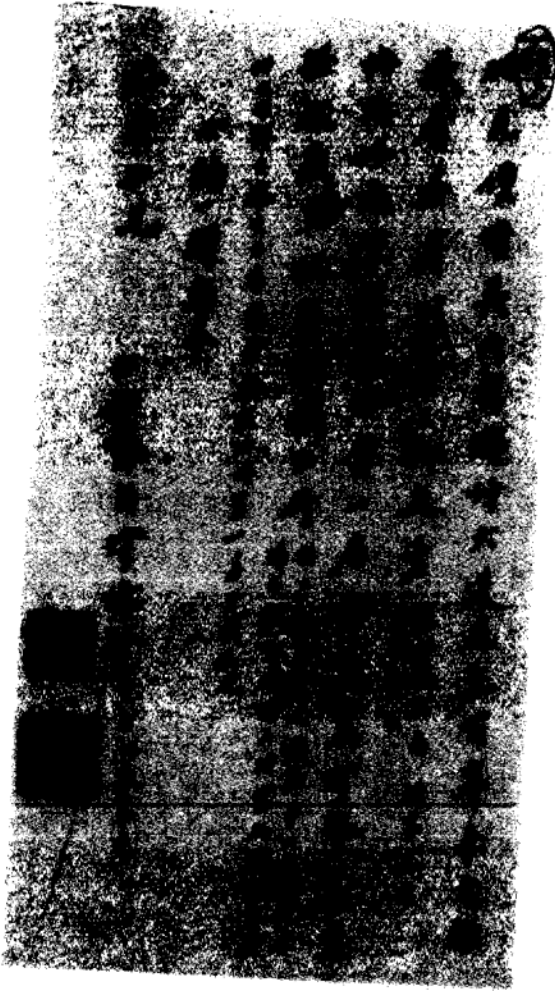
编辑室成员：范 泉(总) 王知伊 周 砌 杨友仁

龚建星 郑晓方

装帧设计：范一辛

本卷责任编辑：周文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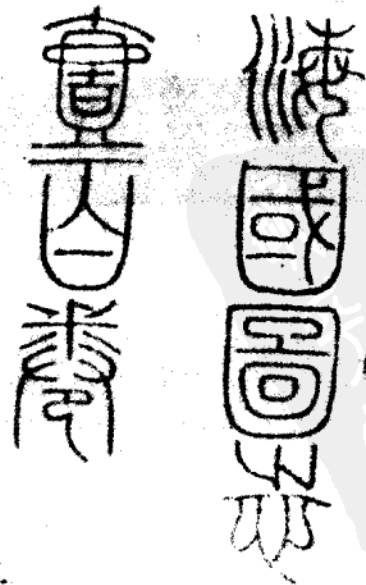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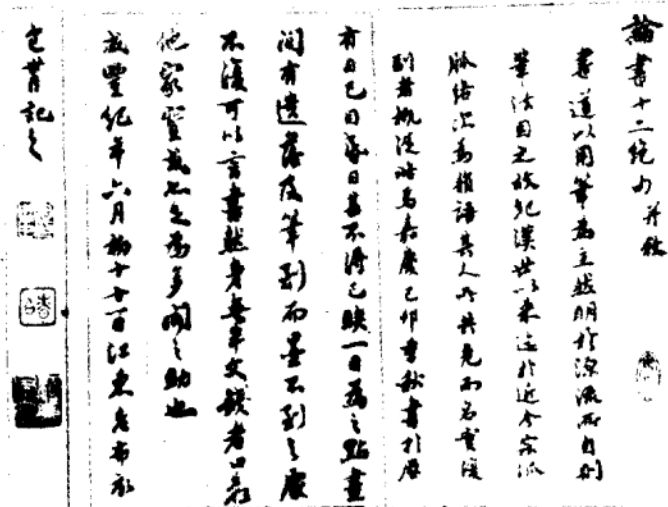
上：与龚自珍齐名、熔经术、政事、文章于一炉的近代开山散文家魏源画像

上左：倡导文学必须有用、开创近代文学新篇章的龚自珍墨迹

下右：系统介绍世界各国概况、提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魏源巨著《海国图志》1852年版封面



右：散文家包世臣像。他提倡言事之文，充分反映了近代要求文章与时务政事相结合的潮流。



左：包世臣学书30年，撰有书学理论名著《艺舟双楫》，为书家大宗。这是他的论书墨迹。

青松勁挺姿凌霄
恥居盤礴出拔
連上松端秋花
起偉烟旂旌
蒼不自立舒光
射九：拓見吐
子敦鶴疑縮
頸還青松不無
華安得保歲寒



上：林則徐像。他的散文，敢于触及主要矛盾，文笔晓畅。他的书函，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，意切情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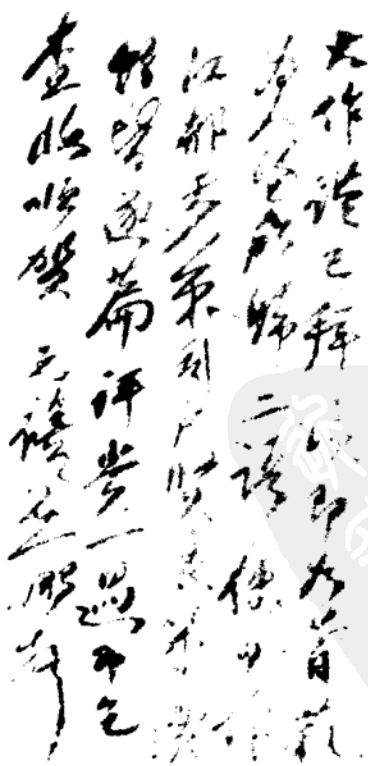
左：林则徐手迹



右：阮元像。他写的碑铭记传等散体文，意蕴酣畅，情思绵邈。



左：李兆洛像。他主张混合骈、散两体之长。他的散文事理交融，和婉真挚，是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。



右：重视文艺与政治相关相称的近代散文家和诗人汤鹏的墨迹

出版说明

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八十年间，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日趋解体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、清王朝腐朽崩溃、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期。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的残酷侵略和掠夺，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民，包括起义农民、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，以及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，群起抗争，自强自救，力求用西方文化取代封建文化。这是民族斗争、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尖锐复杂、空前激烈的时期。反映在文学上，时代的激荡和西洋文学的波涛，有力地冲击了长期来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我国古代文学的深层结构，而开始承前启后的嬗变。虽然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导思想，但它确曾在反帝反封建、反映现实社会、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、文语合一等方面，作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，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。因此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，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承启转折阶段，有着它存在的特殊意义。但是近代文学资料有三个特点：繁、碎、乱，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手抄孤本，仍流存在一些专家个人和作者亲属的手里。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》的编辑，正是为了要把这些浩如烟海、隐显错杂、良莠不齐、濒于佚失的近代文学资料，分门别类地搜集、烛隐、筛选、点校、笺释，并撰写导言和作者小传，整理出一套有点有面、鲜明系统的资料系列，便于文学专业工作者、教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研究、选材、教学和鉴赏。

上海書店

1990年10月

12 专集 30 分卷顺序号

ORDER OF THE 12 DIVISIONS & 30 VOLUMES

- 1 文学理论集： 两卷 第一卷、第二卷
Essays on Literary Theory, 2 Volumes, Nos 1—2
- 2 小说集： 七卷 第三卷至第九卷
Novels, 7 Volumes, Nos 3—9
- 3 散文集： 四卷 第十卷至第十三卷
Prose Writings, 4 Volumes, Nos 10—13
- 4 诗词集： 两卷 第十四卷、第十五卷
Poetry, 2 Volumes, Nos 14—15
- 5 戏剧集： 两卷 第十六卷、第十七卷
Drama, 2 Volumes, Nos 16—17
- 6 笔记文学集： 两卷 第十八卷、第十九卷
Literary Notes, 2 Volumes, Nos 18—19
- 7 俗文学集： 两卷 第二十卷、第二十一卷
Popular Literature, 2 Volumes, Nos 20—21
- 8 民间文学集： 一卷 第二十二卷
Folk Literature, 1 Volume, No 22
- 9 书信日记集： 两卷 第二十三卷、第二十四卷
Letters and Journals, 2 Volumes, Nos 23—24
- 10 少数民族文学集： 一卷 第二十五卷
Literature of the National Minorities, 1 Volume, No 25
- 11 翻译文学集： 三卷 第二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
Translated Literature, 3 Volumes, Nos 26—28
- 12 史料索引集： 两卷 第二十九卷、第三十卷
Index to Historical Materials, 2 Volumes, Nos 29—30

导 言

任访秋

中国近代是充满着激烈动荡和急速变化的历史时代。鸦片战争打破了清帝国的闭关锁国政策,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面前,代表着落后生产力的“天朝上国”显得衰败与腐朽;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,以儒学为标志的传统文化越来越暴露它的空疏与无用。随着列强侵略的不断加剧,民族危机日益加深,一部分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。他们继承了中国文化中反对封建专制、要求思想解放的进步传统,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“民主、科学”精神,在这一新的思想起点上,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,展开了对桎梏人心、抑制民族生机的儒学的批判,兴起了以革新除弊、图强御侮为内容的社会思潮。

这一社会思潮的开创者,应首推龚自珍和魏源。

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夕,就已预感到“衰世”的危机。他不满意封建士子们或沉湎于汉学、或桎梏于宋学的社会风气,主张经世致用之学。他向顽固、愚昧的专制统治者发出不进行改革、就必然灭亡的警告。但因他对西方社会还了解甚少,所以只能向古代改革家那里寻找思想武器,正是“何敢自矜医国手,药方只贩古时丹”(《己亥杂诗》之四四)。而魏源则经历了鸦片战

争后的社会现实,并对西方社会有了较多的了解,于是进一步提出了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的口号。他们虽然分别对程、朱理学的“性善论”和“知先行后说”以及今不如昔的复古主义进行了批判,然而他们还不可能冲决儒家思想的网罗。但在万马齐喑的道、咸之际,他们的议论却如一闪的彗星划破了浓郁的阴霾,在思想界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巨大震动,惊醒了许多迷惘彷徨的知识分子,开始考虑救亡图存的改革方略。

到了同、光时期的康、梁师弟等人,对西方的学习已不再是停留在物质文明上面,而是把着重点转移到了精神文化、政治制度这些更深的层次上,并把改良主义的理论付诸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。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先天软弱,对封建皇帝的依附,决定了他们对儒学批判的妥协性,表现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,借孔子的亡灵给维新运动罩上一层神圣的光圈。梁启超深受乃师的影响,认为:“孔门之学,后衍为孟子、荀卿两派。荀传小康,孟传大同。”“二千年间,宗派屡变,皆盘旋荀学肘下。孟学绝,而孔学亦衰。”(《清代学术概论》)他和谭嗣同、夏曾佑等人把西方的“民权”学说与孟子的“民本”思想相傅会,鼓吹君主立宪。他们通过对荀子的批判,来攻击为封建专制服务的汉、宋儒学。谭嗣同在《仁学》中说:

故常以为二千年之政,秦政也,皆大盗也。二千年之学,荀学也,皆乡愿也。惟大盗利用乡愿,惟乡愿工媚大盗。二者交相资,而罔不托之于孔。

夏曾佑则勇于超越一般维新派的认识水平,称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是“本孔子专制之法,行荀子性恶之旨”(《中国古代史》第一篇第一章第六节)。维新派的排荀,比经世派的反程、朱的思想

内涵深广得多了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解放。

改良运动失败后，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。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场出发，展开了对儒学思想的批判。革命派的理论家章太炎，继承发扬了汉代王充“追难孔子”和“伐孔子之说”的战斗精神，首先举起了批孔的旗帜。他痛斥宣扬“中庸之道”的孔子，实则是“有甚于‘乡愿’的‘国愿’”，是一国中最大的伪君子，并指出“儒术之害，则在混淆人之思想”（《诸子学略说》）。他还自觉地把批孔与反帝、反清结合起来。他揭露西方列强利用儒学进行侵略的实质，他们“籀读吾经纬以号于众曰：‘吾有仲尼之遗计籍焉！’若是，则西教愈杀也，而中国自是终于左衽矣！”（《榘书·忧教》）至于清王朝统治者“尊事孔子，奉行儒术”，在于“便其南面之术，愚民之计”（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）。刘师培继章太炎而起，撰文批判孔孟之道和纲常名教。在章、刘的带动下，革命派掀起了一阵批判儒学的浪潮。总之，近代对孔学的批判，从经世派、维新派到革命派，恰如剥笋一样，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、由浅入深的过程。这一批判，在近代史上具体表现为学校与科举之争、新学与旧学之争、西学与中学之争。这一批判，推动了反帝、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，并为五四时期“打倒孔家店”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。这一批判，也同时构成了近代文学思想发展的主流，而作为近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散文，也很自然地带着这种鲜明的时代印记。如果循着龚自珍、梁启超、章太炎等人的散文发展脉络，就会从中清楚地看出中国近代史前进的轨迹。

中国近代散文，是由古代散文衍变而来的，但因为西学的东渐，使之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外，又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某些素

质。但这种融合并不是盲目的、无条件地进行着的，它决定于每一个作家从不同的立场、角度，根据自己的需要，象对传统文化的选择那样，对西方文化也有一个取舍改造的过程。例如，以龚自珍、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作家，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的是公平学的通经致用精神，是李贽、戴震等人反对程、朱的民主思想，从西方文化中找到的是中国变革图强的方向。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作家，所恪守的是儒学，尊奉的是程、朱，他们看中了西方的坚船利炮，是因为可以用来镇压人民维护清廷的腐败统治。这种在中西文化上不同的价值取向，是形成近代散文发展史上两大流派的重要因素。经世派作家勇于冲破传统古文的樊篱，敢于向扼杀个性、窒息创新精神的儒家“诗教”挑战，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，呼唤着时代的风雷。继经世派而起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散文作家，对这一传统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都作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。而洋务派作家，则是标举桐城派古文，追步韩、欧，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，在写作技法上也有所增益，但终因囿于传统文化的窠臼，很少出现有价值的作品。至于维新时期，严复和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和小说，是由于深邃的思想和全新的意境，才使古文在文坛上得以象成绮的余霞为人瞩目。

近代散文的第一位作家是龚自珍。他生于“举国醉梦于承平”之中的嘉、道之际，但却能站在时代的峰巅，以哲人的睿智洞察危机四伏的历史，并以不拘一格的散文体式表达对于现实的深邃思考。他不仅在政治上倡言变革，而且在文学观上也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开拓精神。他继承发展了晚明公安派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的理论，在《病梅馆记》中愤怒地谴责了封建专制摧残人性的罪恶，表达了打破一切桎梏、要求自由健全发展的审

美理想。文章中蕴含着要求冲决罗网、解放个性的深厚的社会思想内容。出于这种认识,龚自珍不为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粱谋”的世风所囿,或以谈经论史、或以寓言小品、或以写人记事等多种散文形式寄寓忧愤,针砭时弊,倡言变革。他的散文没有桐城古文的迂拘,又不象选派散文的偶俪,更不象考据家散文的朴拙,而是一种汪洋恣肆、纵横驰骋、豪放跌宕、淑诡谲怪的文章。龚自珍的散文,为近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。

龚自珍的好友魏源,在文论上基本未能超出“文以载道”的正统观点,主张“贯经术、政事、文章于一”(《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》)。他的政论文,议古今成败利病、学术流别,内容翔实,语意明白畅达。他的山水小品清彻冷隽,豁人耳目,有较高的文学价值。经世派中影响较大的散文作家还有林则徐、包世臣等人。

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“不信义法之说”(《复庄卫生书》),提出解放散文的主张。他的《校邠庐抗议》开创了政论散文的新体式。他和王韬、容闳、薛福成、马建忠、郑观应、陈炽等人形成了后期经世派作家群。这些作家比早期经世派作家更注重向西方学习,并初步地以西方的科学、民主思想来观察和试图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,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方略。他们中的许多人到过港、澳及欧、美,对资本主义文化感染较深。其中的王韬、薛福成、郑观应、陈炽等人都倾向于西方的“君民共主”,即君主立宪政体,但在“体、用”问题上仍未与洋务派划清界限。他们为了传播西学,往往把西学的源头附会为中国古代的“圣学”,想以这种调和来消除保守势力对西学的排斥。

后期经世派的作家群中,冯桂芬的《校邠庐抗议》、容闳的

《西学东渐记》、薛福成的《筹洋刍议》、马建忠的《适可斋纪言纪行》、郑观应的《盛世危言》、陈炽的《庸书》、王韬的报刊政论文等研讨时务的著作或文章,不为古文、骈文、时文所限,条分缕析,明白畅达,虽然过于质朴,略少文采,但由于新的思想、新的意境,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,因而流行极广,影响很大。

龚自珍在《尊隐》篇中写道:“山中之民,有大音声起,天地为之钟鼓,神人为之波涛矣。”暗示了革命风暴即将来临。在他去世十年之后,即1851年,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。洪秀全傅会基督教义,创立拜上帝会,并打毁孔子牌位,提出反映农民平等思想的口号。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,洪秀全就文学的变革问题,颁布了《改定诗韵诏》,命令左史右史,把《诗韵》(指《诗经》)中“一切鬼话、怪话、妖话、邪话一概删除净尽,只留真话、正话”。另外,洪仁玕等人发布的《戒浮文巧言喻》,也明确指出“文以纪实”、“言贵从心”,文风要“朴实明晓”,“实叙其事”,反对“浮文巧言”。对待古代典籍采取“弃伪存真,去浮存实”的态度。这和洪秀全的主张是一致的。但在散文的写作上,太平天国却未能留下有价值的篇章。

当经世派作家蓬勃兴起的时候,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曾国藩,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,重张桐城派姚鼐的帜志,为古文的“中兴”竭尽了全力。

桐城派古文在清代文坛上长期居于正宗的地位。方苞、刘大櫆开其端,姚鼐集其大成。姚鼐在提出义理、考证、文章相结合的理论(《述庵文集序》)中,义理指的是程、朱理学,在三者之中占主导地位。正如曾国藩所说的:“三者不可偏废,必义理为

质，而后文有所附，考据有所归。”（《欧阳生文集序》）姚鼐之后，和龚、魏同时期的桐城派作家，影响较大的有所谓的姚门四弟子：梅曾亮、管同、方东树、姚莹。管同和方东树是桐城派道统、文统的忠实捍卫者。方东树著《汉学商兑》，说他平生读书，“惟于朱子言为独契，觉其与孔孟无二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抵触者辄悲恨”。甚至借皇帝的“圣谕”，指责有违于朱熹的，都是“乱经”、“叛道”。他在《答叶溥求论古文书》中，又极力强调桐城的文统所在，他说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所选古文辞，“八家后，于明录归熙甫，于国朝录望溪、海峰，以为古文传统在是也”。正因为这样，方东树和管同的古文，凡涉及社会政治方面的议论，多陈腐不可取。

梅曾亮曾受管同影响，由雅骈文而专攻古文，在文坛上，继姚鼐后颇负盛名。他对古文看法，基本未离桐城派的轨辙。他虽然主张文章应因时而变，但只限于形式，而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则是始终如一（《答朱丹术书》）。梅曾亮的散文力求雅洁，文笔清淡简朴，除少量的写景记事文章外，多为无价值的碑传书序。

姚莹是姚鼐的侄孙，道光初年，他在京师与龚、魏、张际亮、汤鹏等人交好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开始致力于经世之学。他购求外国书籍，关心国内外形势，在任台湾道时，曾积极抗击英国侵略军，所以在他的思想中颇有些经世派作家的色彩。他在散文的写作上，并不株守桐城家法。他强调文章与作者的人格、学识、经历的关系，反对桐城派作家“不求数公（指屈原、司马迁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）之所以为人，而惟求数公所以为文”（《康轺记行》）的形式主义的追求倾向。方宗诚说他：“虽亲炙惜抱，而亦能自出机杼，洞达时务，长于经济。植之先生称其义理多创获，其议论多豪宕，其辩证多浩博，而铺陈治术，晓畅民俗，洞极人

情。”(《桐城文录序》)

桐城派古文,早在乾、嘉时期就为汉文家和骈文家所排斥,到了道、咸时期又为经世派所不齿。后来的曾门子弟薛福成、黎庶昌对桐城古文的衰落都有论述。薛福成在《寄龛文存序》中说:“言古文者,必宗桐城,号桐城派。其渊源所渐远矣。厥后流衍益广,不能无羸弱之病。”黎庶昌在《续古文辞类纂序》中也指出桐城古文的末流有“文敝道丧之患”。桐城古文所以如此地走向末路,是由于拘于“义法”,因袭模拟,不求创新的缘故。此外,太平天国革命,对桐城古文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的冲击,也是促使桐城古文陵替的原因之一,曾国藩在《欧阳生文集序》中,曾对此深为痛心疾首。

曾国藩为配合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、政治活动,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大肆鼓吹尊孔读经和程、朱理学的同时,又极力抬高桐城派古文的地位。他说:“国藩之初解文章,自姚先生启之”(《圣哲画像记》),并在姚鼐的“义理、考证、文章”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之上,“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”(薛福成《寄龛文存序》),且针对桐城古文的空疏,“尽取儒者之多识、格物、博辨、训诂,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,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”(黎庶昌《续古文辞类纂序》)。曾国藩的“经济”,是与其“中兴”清王朝的活动密切相关的。至于“义理”,曾国藩尤为突出它的统帅作用,他早在《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》(道光23年正月17日)家书中就说:“兄之私意,以为义理之学最大,义理明则躬行有要,而经济有本。词章之学,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。”(《曾国藩家书》)桐城“义法”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改造,使桐城古文更能切实地维护封建统治;加上曾国藩的大力提倡,与清王朝的政治“中兴”相呼应,文坛上出现了古文“中兴”的局面。